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如何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

王浩旻 黄漫宇 杨 露

摘要：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是中国在优化供给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亟待完成的重要任务。本文立足国内大循环，从理论与实证层面探究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利于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第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拓展企业创新边界、减少非效率投资、优化供需匹配，进而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第三，企业特征层面，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国有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和非出口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果更强；行业特征层面，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更有利于非制造业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区域特征层面，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作用在城市群成熟度与数字化水平更高的城市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第四，相较于自然性分割，制度性分割降低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够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关键因素。本文为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推动高质量产品供给提供了理论与经验证据。

关键词：全国统一大市场 产能利用率 创新边界 非效率投资 供需匹配

中图分类号：F123.9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产能利用率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始终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总体原则。2013年《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强调要建立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长效机制，并提出“分业施策”的治理手段。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将“去产能”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之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

[资助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双循环’新格局下现代流通体系创新及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编号：21&ZD12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对中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推进策略研究”（编号：23BJL089）。

[作者信息] 王浩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服务经济双循环发展研究中心、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电子邮箱：why031116@163.com；黄漫宇、杨露，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为75.1%^①。这一数值虽然高于75%的国内合意产能利用率标准，但仍低于79%~82%的国际公认水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进一步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研究》课题组，2015）。可见，中国产能利用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新一轮产能过剩风险不容忽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4）。

产能利用率不足会造成社会资源浪费，加剧行业层面资源错配，催生企业间恶性竞争。这不仅会阻碍中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还会对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构成潜在威胁（林毅夫等，2010）。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隔四年再次指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将“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视为经济回升向好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②。产能过剩犹如悬在宏观经济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已然成为制约高质量供给、阻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深层次难题。因此，探究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产能利用率有重要现实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③。可见，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释放内需潜力是提升产能利用率、实现高质量供给的关键途径。然而，受制于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中国各区域形成了“以邻为壑”的发展格局，商品、要素等资源无法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导致国内大循环出现堵点，制约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发挥和内需潜力的充分激发。2022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④。作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坚强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够充分整合国内的要素资源，畅通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这有利于重塑大国竞争优势，是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激发内需潜力的必要前提（刘志彪和孔令池，2021）。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探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关系，不但有助于深化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微观经济效应的理论认识，而且能为中国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红利、优化供给体系提供政策实践参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在于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学术界对产能过剩成因的分析也主要聚焦于市场机制与政府行为，形成了“市场说”和“政府说”两种观点。“市场说”强调产能过剩是由市场主体的投资决策引起的。部分国外学者指出，企业可能通过战略性过度投资构建进入壁垒，以过剩产能向潜在竞争者发出威胁信号，抑制其市场进入动机（Chaturvedi and Martínez, 2016）。国内学者结合中国基本国情指出，在发展中国家情境下，由于市场信息存在不完全与不对称

^①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2/content_6934935.htm。

^②参见《政府工作报告》，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3/content_6939153.htm。

^③参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④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2/content_5687499.htm。

的情况，企业极易对特定新兴产业的投资机会形成同质性认识，进而引发“潮涌现象”，造成严重产能过剩（林毅夫等，2010）。与此不同，“政府说”强调制度性因素在产能过剩形成中的关键作用，将财政分权体制、官员晋升锦标赛等制度安排视为重复建设的主要原因（包群等，2017），并认为“市场说”难以解释为何在重复建设的产业中仍有新增投资持续涌入的现象（江飞涛等，2012）。

事实上，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既源于市场失灵，也与政府干预密切相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进一步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研究》课题组，2015），提升产能利用率需要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有机交互。近年来，随着政府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日益重视，学者们开始关注到市场一体化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卞元超和白俊红（2021）认为市场一体化能够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缓解产能过剩问题，但马红旗和田园（2018）、范欣和李尚（2020）指出市场一体化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提高了本地企业竞争压力，在特定条件下不利于产能利用率提升。可见，目前学术界针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关系尚未达成共识。在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当下，亟待深入探究二者的因果关系。鉴于此，本文立足国内大循环，深入剖析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旨在从优化企业产能利用的视角探索驱动高质量供给的有效路径。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拓展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企业产能利用率的研究视角。现有文献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因果关系尚未达成共识。本文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高效协同的角度出发，从微观层面分析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驱动高质量供给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考察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第二，本文基于化解产能过剩的本质要求，结合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内涵与特征，从创新边界、非效率投资和供需匹配三个方面探究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作用机理。特别地，本文创新性地构建“供需匹配”指标，并将其引入影响机制分析中，弥补现有文献在研究产能过剩的治理手段时仅用供给端与需求端单一分析范式的不足，为揭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传导路径提供有益借鉴。第三，本文进一步挖掘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深层次原因。已有研究认为，经济、政治等人为因素造成的制度性分割和自然因素导致的非制度性分割，是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因素（范欣等，2017）。为此，本文构建相应指标来衡量制度性分割与自然性分割，并实证检验不同成因下的差异化影响，为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提供针对性的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产能利用率偏低不仅是市场失灵的结果，还是政府不正当干预的后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进一步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研究》课题组，2015）。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规则统一为基础，以公平、充分的市场竞争为核心动力，主要表现为商品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刘志彪和孔令池，2021）。通过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高效协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了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具体体现在：第一，政府作用发挥依赖健全的市场环境。有效的市场环境不

仅可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推动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还能通过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来淘汰那些长期产能过剩、效率低下的企业，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余东华和吕逸楠，2015）。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冰山运输成本被视为影响生产空间布局活动的关键因素，较高的冰山运输成本会形成多个规模较小的区域性市场，引发市场分割问题。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提升，冰山运输成本下降将成为必然趋势。Eaton-Kortum 模型的推导过程表明，市场规模会随着冰山运输成本的降低而上升。因此，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利于扩大市场规模（Eaton and Kortum, 2002）。广袤的市场空间可以直接拓展企业产品的销售渠道，为消化过剩产能创造更多机会，从而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在异质性企业模型中，冰山运输成本的下降推动零利润生产率临界值向右移动，意味着企业必须具备更高的生产率才能维持市场中的生存地位（Melitz, 2003）。在市场竞争压力下，市场中的资源配置趋于优化，在位企业通过剥离低效率的生产环节，提升产品供给的质量和效率；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因无法适应新的市场环境而加速退出，有效减少市场上低端无效产能，从而整体上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毛其淋等，2024）。

第二，政府“有为”的关键在于尊重有效市场，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功能边界。所谓“有为”，不仅指政府积极地介入经济活动，更重要的是规避政府对市场的不正当干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需要政府最大限度地减少不正当干预，破除区域封锁与市场分割，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不同区域、不同主体之间自由流动，进而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刘志成，2022）。在帕累托最优条件下，生产要素的实际报酬将直接反映其边际收益，这促使企业根据要素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变动，灵活调整生产要素配置，进而提升要素供给效率和产能利用率。进一步，全国统一大市场通过建立统一的公平竞争制度、产权保护制度与市场准入制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强市场整体效率，为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创造良好市场环境（胡家勇，2023）。具体而言，公平竞争制度能够避免行业内部恶性竞争，防止“产能攀比”等行为；产权保护制度通过确保不同类型和规模的企业能得到同等对待，激发企业竞争动力和发展潜力；市场准入制度则有助于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减少政府庇护和隐性福利导致的市场扭曲，提升市场开放性和透明度。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H1。

H1：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利于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

（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作用机制

1. 拓展企业创新边界。在企业生产过程中，技术效率低下会导致实际产出偏离潜在产出，从而抑制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董敏杰等，2015）。创新是提升技术效率的关键途径，与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密切相关。大量研究表明，企业创新活动能够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杨振兵，2016；刘若鸿和许晏君，2023）。然而，既有文献主要关注以企业专利技术为代表的创新总量增长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作用，并未探讨究竟是现有技术领域的渐进式改良，还是新技术领域的探索对企业产能利用率产生影响。与渐进式改良相比，企业对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意味着创新边界的拓展（沈坤荣等，2023），这一过程不仅需要更加多样化的知识基础，而且形成的技术组合需具备较强路径依赖性，对技术要求更高，创新难度与变革力度也更大。因此，竞争对手难以通过技术模仿与替代实现追赶。这种技术不可替代性有助于企业建立持续的技术优势（Christensen, 1997），进而通过不断拓展企业生产前沿面、优化生产工艺流程、提升产品质量，最终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刘若鸿和许晏君，2023）。这种转化

不仅能够强化企业现有市场锁定效应，也有助于企业开拓更加广阔的潜在市场，从而推动企业产能利用率持续提升（Bloom et al., 2016）。此外，企业创新边界拓展所需的高技术门槛特征能够有效避免新产品投资可能引发的“潮涌现象”，从而对化解产能过剩产生积极作用。

探索 and 研发新技术是一项复杂的创新活动，需要较多资金投入、面临较高的失败概率以及较长的研发周期，这些因素抑制了企业拓展创新边界的动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弱化区域壁垒和促进商品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为企业拓展创新边界提供了有力支持。一方面，企业研发新技术需要较高的技术知识水平，这往往会涉及对未知领域的探索。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打破了知识传播的地域限制，有助于加快技术知识的跨区域扩散，由此拓展知识溢出的范围（卞元超和白俊红，2024）。这一过程促使更多差异化知识在更广泛区域内交融与重构，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多知识种类和学习机会。这有助于企业更全面地整合创新资源，形成外部吸收和内部积累的技术知识库，进而缓解技术创新遇到的知识困境，推动企业研发具有发展前景的新技术，拓展创新边界。另一方面，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企业拓展创新边界提供了多样化的创新要素供给。就劳动力要素而言，新技术的突破依赖于高素质人才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劳动力和人才流动中的核心作用，通过构建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消除行业、身份、性别等方面的歧视（向雪风和牛耕，2025），促进研发人员跨区域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从而满足企业对高水平人才的需求。就资本要素而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助于打破区域性融资壁垒，改善行政力量控制资本配置所形成的“金融抑制”现象，优化资本使用效率，进而丰富企业融资渠道，提升企业融资的便利性与可得性（刘志成，2022），有效缓解企业在研发创新方面的融资约束，促使企业能够更灵活地投资新技术项目。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H2a。

H2a: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利于拓展企业创新边界，从而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

2. 减少企业非效率投资。企业盲目且过量的低效率投资行为对产能利用率产生了“供给抑制”与“需求压制”的双重拖累效应。一方面，企业盲目投资行为降低了企业资本使用效率，引发了资本错配，进而减少了企业实际产出水平，导致企业在供给端的产能利用率下降；另一方面，在市场需求无法快速扩张的背景下，过度投资产生的大量产品供给难以被市场消化，供过于求的矛盾不断加剧，从而在需求端进一步抑制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杨振兵，2016）。当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得到有效抑制后，市场中盲目跟风的投资热潮逐渐回落，企业将充分识别市场机遇和项目风险，避免无谓的资源浪费，提升投资效率，进而促进自身产能利用率的有效提升（林毅夫等，2010）。

“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机制被视为导致市场分割的深层次原因（刘志彪和孔令池，2021）。在财政分权和晋升锦标赛的作用下，地方政府肩负着推动本地经济增长的重要责任，其提升执政业绩的需求尤为迫切。这种压力会强化地方政府对企业投资活动的干预动机，通过各种不合理的政策优惠手段，影响企业正常的投资行为。具体表现为政府通过非市场手段引导大量资金进入某一行业，进而催生企业过度投资现象。过度投资引发重复性建设问题，最终导致企业产能利用率下降（江飞涛等，2012）。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实施负面清单制度来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有助于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正当干预，改变市场分割下的信号失真问题，使企业能够根据准确的供需关系和价格信号来选择投资领域，从而降低非效率投资。企业的过度投资并非仅由政府不正当干预导致，还与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密切

相关（林毅夫等，2010）。委托代理理论表明，企业所有者与管理者间的信息不透明可能促使管理者做出违背所有者利益的决策，引发委托代理问题。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强化市场竞争，倒逼企业提升信息披露透明度，增加利益相关者关注（陈胜蓝和马慧，2017），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委托代理问题，约束了管理者在投融资中的短视行为，从而有效抑制过度投资。因此，本文提出 H2b。

H2b: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利于减少企业非效率投资，从而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

3. 优化企业供需匹配。产能过剩的实质是企业在“事前”建立的生产能力与市场在“事后”消化这些产出的能力之间存在偏差（林毅夫等，2010）。这种偏差反映了企业对市场需求的判断失误与反应滞后。企业通常会根据对未来市场需求的预测进行生产规划，但当实际产品供给与市场需求不匹配时，就会出现企业产能闲置问题。因此，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关键在于平衡产品供给与市场需求。

流通作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桥梁，是优化供需匹配的重要环节。建设成熟的现代流通体系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标志，现代流通体系通过高效、顺畅的流通网络，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现生产与消费对接，最大限度地降低流通成本，从而加快商品周转速度，提升供需匹配效率（谢莉娟等，2021）。进一步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供给端与需求端协同发力，实现产品供给与市场需求间的高效对接，从而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在供给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打通区域间原本封闭的信息通道，拓宽了企业获取市场信息的范围，有利于企业更加准确地将市场需求反映到生产决策中。企业根据用户需求优化供给，从而提高“事前”企业产品的市场定位与消费者偏好的一致性，满足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与高品质的需求。海量的市场信息也将推动企业向柔性生产转变，使其在面对需求波动时，能够更加灵活地调整生产、设计与销售行为（王永进等，2017）。这种柔性生产模式不仅可以及时消除企业无用的生产资源，也增强了企业应对市场冲击的能力，提高了供需匹配效率。同时，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促进区域间的资源与信息共享，降低了企业间在签订与履行契约过程中的搜寻、谈判和监督等交易成本（蔡真和万兆，2023），有助于企业寻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使“事前”生产能力得以充分利用。在需求端，市场分割把各个区域划分为若干个独立单元，这种空间区隔导致消费者的商品选择范围往往局限于本地区域。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了区域间的贸易壁垒，促使各种商品能够更加顺畅地跨区域销售，从而丰富了消费者的商品选择集，有利于扩大消费规模，增强“事后”消化供给端商品的能力。随着消费者可选择的产品种类增加，他们开始追求在质量、功能和体验等方面具有差异化的产品，这一趋势导致个性化消费需求逐渐增加，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倒逼生产者优化和调整产品结构，以更好满足市场需求（魏滨辉等，2023）。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H2c。

H2c: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利于优化企业供需匹配，从而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为研究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如下基准模型：

$$CU_{fit} = \beta_0 + \beta_1 MAI_{it} + \theta X_{fit} + \xi_f + \eta_c + \delta_t + \varepsilon_{fit} \quad (1)$$

(1) 式中：下标 f 、 c 、 i 、 t 分别表示企业、行业、城市和年份；被解释变量 CU_{ft} 表示城市 i 中的企业 f 在年份 t 的产能利用率；核心解释变量 MAL_{it} 表示城市 i 在年份 t 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 X_{ft} 表示一系列重要的控制变量； ξ_f 、 η_c 、 δ_t 分别表示企业、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ε_{ft} 表示随机误差项； β_0 表示常数项； β_1 表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代表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 θ 表示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本文将标准误差聚类至城市层面。

(二) 变量测度

1. 被解释变量：企业产能利用率。相较于峰值分析法、生产函数法、成本函数法等测算产能利用率的方法，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和随机前沿分析法（SFA）能够有效规避价格、成本、利润等因素的干扰（于斌斌和陈露，2019）。与 DEA 法相比，SFA 法在测算过程中包含了企业的跨期决策，确保了不同时期内生产前沿面的可比性，并且该方法更加全面地考虑了生产要素利用率以及技术进步差异，可以较好地消除随机误差影响（郭庆旺和贾俊雪，2004）。本文参考杨振兵（2016）、李雪松等（2017）的研究，选取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来测算企业产能利用率。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相比，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要素产出弹性揭示了投入要素之间的替代效应和相互作用，并且放宽了技术中性这一前提，使模型能够反映经济系统的更多特性，其结果也与经济现实更加吻合。具体计算形式如下：

$$\begin{aligned} \ln Y_{ft} = & \alpha_0 + \alpha_1 t + \frac{1}{2} \alpha_2 t^2 + \alpha_3 \ln K_{ft} + \alpha_4 \ln L_{ft} + \alpha_5 t \times \ln K_{ft} + \alpha_6 t \times \ln L_{ft} \\ & + \frac{1}{2} \alpha_7 \ln K_{ft} \times \ln L_{ft} + \frac{1}{2} \alpha_8 (\ln K_{ft})^2 + \frac{1}{2} \alpha_9 (\ln L_{ft})^2 + v_{ft} - \mu_{ft} \end{aligned} \quad (2)$$

(2) 式中： Y_{ft} 表示企业 f 在年份 t 的产出，采用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衡量； K_{ft} 表示企业 f 在年份 t 的资本投入，采用企业固定资产净额衡量^①； L_{ft} 表示企业 f 在年份 t 的劳动力投入，采用企业员工人数衡量； t 表示年份； v_{ft} 表示随机误差项，服从 $(0, \sigma_v^2)$ 的正态分布； μ_{ft} 表示技术损失误差项，用来评估技术无效率，服从 (μ, σ_μ^2) 的半正态分布； α_0 、 α_1 、 α_2 、 α_3 、 α_4 、 α_5 、 α_6 、 α_7 、 α_8 、 α_9 为待估计系数。

本文将企业产能利用率定义为企业当前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期望值之比，如下式所示：

$$CU_{ft} = \frac{E[f(K, L, \alpha) \exp(v_{ft} - \mu_{ft})]}{E[f(K, L, \alpha) \exp(v_{ft} - \mu_{ft}) | \mu_{ft} = 0]} = \exp(-\mu_{ft}) \quad (3)$$

(3) 式中： CU_{ft} 表示企业 f 在年份 t 的产能利用率；其余变量的含义与 (2) 式一致。

2. 解释变量：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现有文献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测度方法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基于市场整合程度的测度方法，如构建市场一体化指数（吕冰洋和贺颖，2022）与多维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付成林和王德新，2023）；二是基于制度变迁的准自然实验设计，如城市群发展规划（丁

^①在具体测算过程中，本文对主营业务收入（元）、固定资产净额（元）使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处理。

涛等, 2024) 和“撤县设区”改革 (Han and Wu, 2024) 等政策冲击。其中, 基于相对价格法测算市场一体化指数是较为常见的测算方法。相对价格法主要基于冰山成本理论, 其将交易成本视为区域间“一价定律”失效的原因, 认为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区域间商品或要素的价格无法完全一致, 而是在一定区间内浮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商品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 而同一商品或要素的区域价格差异, 可以用来衡量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 (刘志彪, 2022)。因此, 本文将市场一体化指数作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的代理变量。现有大部分文献仅从省级层面的商品市场角度衡量市场一体化水平的做法较为片面。事实上, 在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商品市场分割已有所缓解, 而要素市场化改革显得更加迫切。基于此, 本文综合考虑商品、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市场, 从城市层面测算市场一体化综合指数, 以此衡量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

首先, 本文参考桂琦寒等 (2006) 的研究, 采用相对价格法测度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指数。其中, 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选取八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测算^①,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指数选取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城镇集体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其他单位职工平均工资进行测算。其次, 由于国家统计局自 2020 年起停止编制分类别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 这给本文采用相对价格法测算资本市场一体化指数带来了挑战。本文参考范子英和周小昶 (2022) 的研究, 采用上市母公司在其他城市设立子公司的数量来衡量资本要素在城市之间的自由流动程度。此外, 为排除地理距离对商品与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影响, 本文使用城市之间直线距离的倒数作为权重, 测算任意两个城市之间的商品、劳动力与资本要素市场一体化指数。最后, 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各分项市场一体化指数进行综合赋权, 以此得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

3. 机制变量: 企业创新边界。本文参考 Byun et al. (2021)、沈坤荣等 (2023) 的研究, 采用两种方式测度企业创新边界^②: 一是企业每年在新技术领域申请的专利数量, 通过新技术领域专利申请数量的增长来反映创新边界的拓展; 二是“与上一年的技术相似度”指标, 企业在年份 t 与年份 $t-1$ 时专利技术空间之间的相似度越高, 技术路径与前一年越相似, 创新边界越窄, 反之创新边界则越宽。

4. 机制变量: 企业非效率投资。非效率投资是企业管理者由于决策失误而产生的实际投资偏离最优投资规模的行为, 本文借鉴 Richardson (2006) 的研究, 通过企业上一期的相关数据, 基于预期投资模型估算出的残差来反映实际投资水平与最优投资水平之间的差距, 以此表示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③。本文对估算出的残差值取绝对值, 残差绝对值越大, 说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水平越高。

5. 机制变量: 企业供需匹配水平。本文参考 Shan et al. (2014) 的思路, 采用企业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分别测度企业供需偏离度, 以此反向表征企业供需匹配水平^④。企业生产波动与需求波动之间

^①在具体测算过程中, 本文选取包含食品类、烟酒类、衣着类、交通和通信类、居住类、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类、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类、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在内的八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测算。

^②限于正文篇幅, 企业创新边界变量的具体计算方式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 1。

^③限于正文篇幅, 企业非效率投资变量的具体计算方式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 2。

^④限于正文篇幅, 企业供需匹配水平变量的具体计算方式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 3。

的偏离度越低,企业供需匹配水平越高。

6.控制变量。本文分别从企业与城市两个维度选取控制变量。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成立年限、企业规模、资本结构、盈利能力、现金流量、固定资产比率、两职合一与股权集中度,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与财政支出水平。

(三) 数据来源

考虑到中国在 2007 年对会计准则进行了较大调整,因此,本文选取 2007—2022 年中国所有的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并对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第一,剔除处于 ST、*ST 等非正常状态的上市公司,仅保留 A 股正常上市的公司;第二,剔除属于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第三,剔除主要变量缺失的上市公司;第四,剔除 2021 年和 2022 年上市的公司。本文采用的企业层面数据和用于测算资本市场一体化指数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①;城市层面数据来源于 2007—2023 年的各城市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等。表 1 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企业产能利用率	采用 SFA 法计算的企业产能利用率	31926	0.8448	0.0790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市场一体化综合指数	31926	0.4075	0.0723
企业创新边界 1	企业当年在新技术领域申请的专利数量(个)	31926	8.6570	19.1995
企业创新边界 2	企业当年与上一年的技术相似度	18829	0.6099	0.3276
企业非效率投资	采用预期投资模型计算的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	26981	0.0425	0.0873
企业供需匹配水平 1	采用营业收入计算的企业供需偏离度	29024	1.5697	4.6031
企业供需匹配水平 2	采用营业成本计算的企业供需偏离度	29024	1.9522	8.0409
企业成立年限	企业成立年数(年)	31926	17.6007	6.2250
企业规模	企业总资产(亿元)	31926	175.8330	878.2403
资本结构	企业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	31926	0.4233	0.2075
盈利能力	企业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	31926	0.0399	0.0763
现金流量	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与总资产的比值	31926	0.0493	0.0752
固定资产比率	企业固定资产净额与总资产的比值	31926	0.2087	0.1624
两职合一	企业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为同一人:是=1,否=0	31926	0.2749	0.4465
股权集中度	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占比	31926	0.3499	0.1534
经济发展水平	城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31926	10.4753	5.3182
对外开放水平	城市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	31926	0.6366	0.5604
财政支出水平	城市财政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	31926	0.1553	0.0856

注:在回归中,创新边界 1 以“个”为单位加 1 后取对数处理,企业成立年限以“年”为单位取对数处理,企业规模 and 经济发展水平以“元”为单位取对数处理。

^①资料来源:国泰安(CSMAR)数据库, <https://data.csmar.com>。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汇报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基准回归结果。(1) 列表示仅控制企业与年份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2) 列表示引入企业层面控制变量且控制企业与年份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

(3) 列为进一步加入城市层面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在加入全部控制变量后,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估计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4) 列表示加入全部控制变量且进一步控制行业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 与 (1) 列、(2) 列和 (3) 列的回归结果一致,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估计系数同样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利于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由此, 假说 H1 得到验证。

表 2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企业产能利用率	(2) 企业产能利用率	(3) 企业产能利用率	(4) 企业产能利用率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026*** (0.009)	0.025*** (0.009)	0.025*** (0.008)	0.026*** (0.008)
企业控制变量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城市控制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31903	31903	31903	31903
R ²	0.965	0.966	0.966	0.966

注: ①***表示 1% 的显著性水平; ②括号中的数值表示聚类至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③在回归中, 高维固定效应会自动删除部分观测值。

（二）稳健性检验^①

1. 替换被解释变量。第一, 在采用 SFA 法测度时, 本文将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更换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后重新测度企业产能利用率。第二, 考虑到企业资产周转率与产能利用率之间密切相关(李雪松等, 2017), 本文将资产周转率作为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代理变量, 其中, 资产周转率采用企业营业收入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上述回归结果显示,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

2. 替换解释变量。第一, 直线距离通常被用于衡量城市间的地理距离, 但该指标并未考虑到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对距离的影响。为更加真实地反映城市间地理距离对商品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阻碍, 本文采用城市间驾车距离来代表地理距离, 并以此作为权重, 对城市间相对价格波动的方差重新进行加权平均。第二, 本文将全国统一大市场分项指标的赋权方法由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替换为熵权 TOPSIS 法。采用上述两种方式重新测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 并重新进行回归, 结果显示, 全国统一大

^①限于正文篇幅, 稳健性检验结果的具体说明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 4。

市场建设水平提升仍然可以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

3.排除特殊事件影响。第一，周期性产能过剩观点认为企业产能利用率会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变化。为排除经济周期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本文参考陈冬等（2016）的做法，将中国每年的GDP增长速度与样本期内的均值相比较来测度经济周期变量。如果当年的GDP增长速度高于样本期内的均值，则将该年视为经济扩张期，经济周期变量取值为1；若低于均值，则将该年视为经济衰退期，经济周期变量取值为0。本文在基准模型中引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经济周期变量的交乘项进行回归。第二，由于企业的生产经营会受到重大事件冲击的影响，本文考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5年中国股市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可能会给企业产能利用率带来的外部冲击，依次对剔除2008—2009年、2015年、2020—2021年以及上述三个时间段的样本予以重新检验。回归结果显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的结论仍然成立。

4.其他稳健性检验。第一，考虑到城市特征变量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本文在加入企业、行业与年份固定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城市固定效应。第二，本文将原有标准误的聚类层级从城市层面调整至企业层面进行估计。第三，为了减少极端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第四，鉴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本文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行滞后一期、滞后二期处理。第五，由于本文测算的企业产能利用率处于0到1之间，为了使被解释变量适当分散且符合线性分布的特征，本文对企业产能利用率指标进行对数处理。同时，为了排除被解释变量双边限制可能给最小二乘法估计带来的偏差，本文采用Tobit模型来研究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上述回归结果均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呈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内生性处理

1.工具变量估计^①。在研究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时，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就遗漏变量问题而言，本文控制了企业与城市维度的特征变量，并采用高维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估计，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就反向因果问题而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宏观变量，而微观层面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变化难以影响到宏观变量，因此，反向因果问题出现的可能性较小。基于严谨性考虑，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来进一步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选用平均海拔作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工具变量。这一工具变量的合理性在于：平均海拔较高的地区地理条件更加复杂，这会形成自然性市场分割，阻碍商品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从而降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因此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条件；同时，海拔是由长期地质运动形成的固有地理特征，因此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条件。考虑到平均海拔不随时间变化，本文将相邻城市的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均值作为外生时间趋势，与经过对数处理的平均海拔变量交互后得到最终的工具变量1。此外，本文借鉴张杰等（2011）的研究，采用Lewbel法构建各城市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与剔除自身后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均值差额的三次方作为工具变量2。Lewbel法减少了对传统外部工具变量

^①限于正文篇幅，工具变量估计的具体回归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5。

的依赖，提升了模型估计的有效性，并能够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与外生性假设。

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工具变量进行检验，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结果显示，工具变量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均有显著影响；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超过 Stock-Yogo 检验 10%水平上的临界值，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假设；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在 1%的水平上显著，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假设；以上检验结果证明了工具变量的合理性。同时，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估计系数至少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再次验证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够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

2.外生政策冲击^①。《意见》强调，要结合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鼓励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区域，在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前提下，优先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工作。可见，城市群建设是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的重要着力点。国家级城市群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与创新力的区域，国家层面批复的城市群发展规划对城市群内部的规则共建、市场共治、信息共享、设施共联等方面进行了统筹规划，增强了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发展的协同性，促进商品要素资源跨区域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有利于实现区域性市场的统一。当这些区域性市场积极对内对外开放，则能更好地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基于此，本文将国家级城市群规划的实施视为准自然实验，从外生政策冲击的视角检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本文参考张涛和李均超（2023）的研究，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来识别国家级城市群规划实施与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因果关系，并将双重机器学习模型的样本分割比例设定为 1：4，利用随机森林算法对主回归与辅助回归进行预测求解。回归结果表明，国家级城市群规划的实施能够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这说明，在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核心结论依然稳健。

（四）影响机制分析

1.拓展企业创新边界。表 3（1）列和（2）列汇报了拓展企业创新边界的机制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增加了企业在新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并降低了与上一年的技术相似度，有效推动了企业创新边界的拓展。具体来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打破区域间壁垒，加速技术知识的跨区域扩散，帮助企业解决创新边界拓展中的知识困境。同时，商品、要素等资源的自由流动有助于缓解企业在拓展创新边界过程中面临的人才短缺、资金匮乏等问题。随着企业创新边界不断拓展，企业技术路径越来越宽，新技术的不可替代性扩大了企业生产前沿面，从而提升了企业产能利用率。由此，假说 H2a 得到验证。

表 3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影响的作用机制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5)
		企业创新边界 1	企业创新边界 2	企业非效率投资	企业供需 匹配水平 1	企业供需 匹配水平 2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661** (0.323)	-0.187* (0.099)	-0.038* (0.021)	-1.693* (0.888)	-2.438* (1.384)

^①限于正文篇幅，双重机器学习模型的具体构建方式和检验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 6。

表3 (续)

企业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城市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31903	18709	26645	28917	28917
R ²	0.528	0.533	0.188	0.150	0.147

注：①**和*分别表示 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中的数值表示聚类至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③表中回归均已控制企业、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2.减少企业非效率投资。减少企业非效率投资机制的检验结果见表3(3)列,结果显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减少企业非效率投资。从政府层面而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限制政府不正当干预行为,使得企业可以依据市场机制传递出的供需关系、价格信号和竞争情况做出理性决策,减少非效率投资。从企业层面而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高了市场竞争水平,迫使企业主动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以吸引外部投资者关注,有助于减少委托代理冲突,抑制非效率投资行为,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由此,假说 H2b 得到验证。

3.优化企业供需匹配。表3(4)列和(5)列展示了优化企业供需匹配机制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够降低企业生产波动与需求波动之间的偏离度,提升企业供需匹配水平。具体而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仅拓宽了企业获取市场信息的渠道,推动供给端的适应性重构,也增加了消费者的产品选择,提升需求端对产品的消化能力。而现代流通体系的建设能够加快商品流通与周转速度,提高流通效率。供给、流通、需求的有机交互有利于更好地促进供需匹配,为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提供强大动力。因此,假说 H2c 得到验证。

五、进一步分析与讨论

(一) 考虑企业特征的异质性分析^①

1.股权性质。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这可能会使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在不同性质的企业中存在异质性。本文根据上市公司的股权性质,将样本划分为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回归结果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的企业产能利用率,但对非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不显著,费舍尔组合检验的经验 p 值说明分样本回归通过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可能的解释是,国有企业在地方财政收入体系中具有特殊地位,地方政府对其具有更强烈的干预动机。这种干预主要表现为通过设置行政壁垒来限制外来企业的进入,从而保护本地国有企业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市场分割。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有效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减少政府的不正当干预,而这一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够更大程度地提升国有企业的企业产能利用率。

2.融资约束。融资约束会限制企业进行资本性投资,降低企业调整生产能力的灵活性,从而阻碍

^①限于正文篇幅,具体异质性分析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7。

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本文采用 SA 指数来衡量企业融资约束,将低于 SA 指数中位数的样本定义为低融资约束企业,反之则为高融资约束企业。结果显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显著提升了低融资约束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但对高融资约束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没有显著影响,这一差异通过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这可能是因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虽然改善了行政力量控制资本配置所形成的“金融抑制”现象,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但在短期内,高融资约束企业与低融资约束企业在资金实力和金融支持获取能力上存在差异。相较于高融资约束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的资金实力就较为雄厚。这类企业往往具有较强的财务稳定性和较高的信用评级,更易获得融资支持(Ferrando and Ruggieri, 2018)。这使得低融资约束企业在融资环境改善后能更快地利用资金进行研发创新和生产线改造,促进生产能力快速调整,从而更好地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

3. 对外贸易。对外贸易产生的产能过剩化解效应已被众多学者证明(杨振兵, 2015; 毛其淋等, 2024),那么,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作用是否存在差异?本文根据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批注中的损益项目,识别企业是否存在出口行为,据此划分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由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无论企业是否存在出口行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在非出口企业中更大,显著性水平也更高,说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更有利于提升非出口企业产能利用率,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产生这一异质性的原因可能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将分割的区域性市场整合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性市场。这一过程有利于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扩大内需市场,激发内需潜力。与非出口企业相比,海外市场为出口企业化解过剩产能提供了关键渠道,因此,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带来的边际效应较弱。强大的内需市场为非出口企业提供了广阔市场空间,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边际效应更强,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

(二) 考虑行业特征的异质性分析

1. 行业属性。制造业是中国产能过剩的主要领域,但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其他行业也显示出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问题。为分析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是否存在行业属性的异质性,本文根据企业所属的行业类别,将研究样本划分为制造业与非制造业两个子样本。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利于提升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企业产能利用率,但对非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作用更强,这一差异通过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可能的原因在于,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活动通常具有较强的刚性和周期性,产品创新和更新的周期长于非制造业企业,导致其供需调整的灵活性较低。而非制造业企业的供需匹配较为灵活,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助于其更好地对接市场需求,通过快速地调整服务内容、方式或技术应用来适应市场需求波动,减少供需错配,从而更好地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的作用。

2. 要素密集度。各行业在生产技术水平与要素密集度方面的差异可能会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关系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借鉴鲁桐和党印(2014)的方法,将企业按照要素密集度划分为劳动密集型和劳动非密集型企业,由此展开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产生了正向促进作用,但在非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全国统一大市场

建设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费舍尔组合检验的经验 p 值表明这一差异通过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非劳动密集型企业包含资本密集型企业与技术密集型企业：在资本密集型企业中，由于前期资本投入规模较大、生产设备更新周期较长，企业市场响应速度相对滞后；在技术密集型企业中，企业通常处于技术创新与资源配置的前沿，已经采用了高效的生产手段，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空间有限。而劳动密集型企业多集中在传统农业、制造业与服务业领域，这类企业技术水平较低，同质化竞争现象普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产生的资源配置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为这类企业提升产能利用率提供了较大空间。因此，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更有利于促进劳动密集型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

（三）考虑区域特征的异质性分析

1. 城市群发展阶段。前文研究结果表明，国家级城市群规划的实施对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具有积极作用。然而，不同城市群规划在区域协作深度与开放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可能会影响政策实施效果。因此，本文将建设较早且发展较为成熟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定义为成熟型城市群，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布局的其余城市群视为发展型城市群。本文基于企业注册地，将样本按照城市群类型划分后进行回归估计。结果显示，在成熟型城市群中，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显著提高了企业产能利用率；而在发展型城市群中，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果并不显著。同时，这一差异通过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成熟型城市群内部交流与协作更频繁，功能互补性和要素流动性更强，分工协作程度更深，城市间贸易壁垒也更低。这些因素使得成熟型城市群能够更充分地发挥政策红利，从而更有助于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而发展型城市群的建设规划尚不完善，区域合作机制不够明确，这削弱了城市群规划实施带来的经济效应，导致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不显著。

2. 数字化水平。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城市数字化转型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那么，城市数字化水平的提升是否有助于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产能过剩化解效应？为了探讨这一问题，本文根据企业所在城市是否实施智慧城市建设试点政策来进行分析。智慧城市是通过全面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向数字化转型的新模式。本文将样本划分为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城市和非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城市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相比于非试点城市，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更有利于提升试点城市的企业产能利用率，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支持这一结论。其原因在于，智慧城市试点不仅是对城市治理模式的优化，也是在数字技术层面的创新。通过数字技术的深度渗透与数据要素的广泛赋能，智慧城市试点能够促进商品要素资源的跨区域自由流动，实现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更全面、更高效、更灵活地互联互通，从而显著提升城市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强化其在技术创新促进与资源配置优化中的作用，最终更有效地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

（四）考虑不同市场分割成因的讨论

学术界关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研究始于对市场分割的关注，有学者认为市场分割主要是由制度性因素和自然性因素引起的（范欣等，2017）。其中，制度性因素主要指由行政干预、地方保护主义等所形成的制度性壁垒和体制性障碍。在财政分权体制和“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机制驱动下，地方政府会利用行政权力参与、干预，甚至控制正常的市场活动，主要表现在：一是实施地方政府主导型产

业政策，通过支持那些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影响属地经济发展；二是制定具有限制性、偏向性的行政法规，给予本地企业特殊的待遇，并排除、限制外来企业的竞争。自然性分割则因区域间的气候条件、资源禀赋等差异自然形成，其中，运输成本是关键因素。随着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的飞速发展，要素资源的空间可达性得到大幅提升，区域间运输成本明显降低，自然性分割的影响已显著减弱。相比之下，制度性分割是当前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因素。国务院于 2023 年 9 月 25 日面向社会征集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问题线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专门设立了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执法案例专栏。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有显著正向作用，但这一效应产生的原因究竟是制度性分割的弱化还是自然性分割的消解？下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在测度制度性分割变量方面，本文参考丁从明等（2018）的方法，选取每个城市单位面积内的县级行政单位数量衡量，该数量越多，说明制度性分割程度越高。在测度自然性分割变量方面，采用各个城市到其他城市的平均交通时间表征，该时间越长，表明自然性分割程度越高。具体而言，首先，本文收集了北京大学地理数据平台与 Open Street Map 平台上的中国历年交通路网数据，包括普通公路、高速公路和铁路，并假设这些交通方式的平均运行时速分别为每小时 60 千米、100 千米和 140 千米。其次，借鉴刘冲等（2020）的研究，利用 ArcGIS 软件，基于最短成本路径算法，计算出城市间的最短交通时间。同时，考虑到目前中国交通网络的扩张主要以高铁网络的完善为代表，本文手工检索中国历年的《全国铁路旅客时刻表》，得到不同城市间高铁的最短通行时间。最后，综合普通公路、高速公路、铁路、高铁这四种交通方式下城市间的最短交通时间，选择最小值作为各城市间的最短交通时间，并对城市间的数据在城市层面进行汇总，得到各个城市到其他城市的平均交通时间。

本文将制度性分割变量、自然性分割变量及其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交乘项纳入模型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 4（1）列和（2）列^①。由表 4（1）列可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制度性分割变量交乘项的估计系数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随着制度性分割的降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助于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而表 4（2）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自然性分割变量交乘项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说明自然性分割的降低并未对企业产能利用率产生影响。产能过剩的“政府说”认为，政府的不正当干预是产能过剩的根源。一方面，地方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往往不考虑自身城市的比较优势，导致盲目布局和跟风投资，逐渐形成重复建设、产业雷同、恶性竞争等问题，恶化企业产能过剩现象（包群等，2017）。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保护本地产业发展而采取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不仅制约了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从供给端对企业产能利用率产生负面影响，也抑制了消费需求的扩张，从需求端加剧了企业的产能过剩（杨振兵，2016）。因此，减少制度性分割，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不正当干预，能够有效发挥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进而更好助力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

^①鉴于海南省地理位置特殊，本文在自然性分割的实证检验中未将海南省的上市公司考虑在内。同时，由于缺乏 2007 年与 2008 年的中国交通路网分布图，本文在实证分析中也排除了上述两年的数据。

表 4 考虑不同市场分割成因的检验结果

变量	企业产能利用率			
	(1)		(2)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057***	0.021	-0.005	0.010
制度性分割变量	0.003***	0.001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制度性分割变量	-0.003**	0.002		
自然性分割变量			-0.001	0.000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自然性分割变量			0.001	0.001
企业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城市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31903		29704	
R ²	0.967		0.979	

注：①***和**分别表示 1%和 5%的显著性水平；②标准误为聚类至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③表中回归均已控制企业、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当前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逐渐攀升的背景下，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进一步化解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的关键。本文基于 2007—2022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从理论与实证层面研究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第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拓展企业创新边界的同时，能够有效减少非效率投资，并优化供需匹配，进而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第三，企业特征层面，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更有利于国有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 and 非出口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行业特征层面，在非制造业企业与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效应更强；区域特征层面，城市群成熟度和数字化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产生更加明显的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效应。第四，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过程中，制度性分割的降低促进了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自然性分割在其中的作用并不明显。

基于上述分析和研究结论，本文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协同，通过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于中央政府而言，一方面，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通过完善地方税收、转移支付及区域间利益补偿机制，加强地方政府的自主财力，有序推动财政资金在地方层面的再分配，减少由区域间争夺流动性税基引发的市场无序竞争，着力解决地方政府事权与财力不匹配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完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改变仅以经济增长速度作为晋升标准的做法。应增加对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的考核，实现从“晋升锦标赛”到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转变，避免地方政府为维护本地经济利益而固守市场分割策略。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应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既要减少对市场

资源的直接配置，避免对微观经济主体的不正当干预，也要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举措，构建高效服务型政府，持续提升行政效能。

第二，着力通过削弱制度性分割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从而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一方面，应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的统一性，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与社会信用等领域建立统一的基础性制度框架，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保障市场主体在平等基础上利用各类要素资源创造财富，以制度统一降低区域间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地方政府在执法司法过程中需坚持依法行政，确保统一的制度规则得到公平公正执行。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废除各类不合理的制度规则，破除地区间地方保护与市场壁垒。不合理的制度规则会阻碍充分竞争与公平竞争，需依法严厉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行为，规范地方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杜绝歧视性支持政策，加快清理阻碍自由、平等的市场准入与退出规定，消除要素获取与经营运行中的隐性壁垒，从而为企业营造优质的营商环境。

第三，优化新技术研发环境以促进技术创新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有机融合。研发新技术伴随着较高不确定性和风险，需要政府主动引导与积极支持以降低企业研发风险。地方政府应强化跨区域合作，搭建技术攻关、产业协作与人才交流平台。同时，加强产学研协同发展，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机制，推动关键技术联合攻关，拓展知识溢出范围，促进技术研发所需的要素资源在更广阔空间内流动。此外，企业研发创新的活力与区域内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密切相关，政府要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持续提升知识产权行政与司法保护水平，为企业研发新技术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 1.包群、唐诗、刘碧，2017：《地方竞争、主导产业雷同与国内产能过剩》，《世界经济》第10期，第144-169页。
- 2.卞元超、白俊红，2021：《区域市场整合能否提升企业的产能利用率？》，《财经研究》第11期，第64-77页。
- 3.卞元超、白俊红，2024：《全国统一大市场、地区技术多样化与企业技术复杂度》，《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6期，第129-150页。
- 4.蔡真、万兆，2023：《区域市场整合与中国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中国农村经济》第11期，第140-163页。
- 5.陈冬、孔墨奇、王红建，2016：《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经济周期与国企避税》，《管理世界》第5期，第46-63页。
- 6.陈胜蓝、马慧，2017：《卖空压力与公司并购——来自卖空管制放松的准自然实验证据》，《管理世界》第7期，第142-156页。
- 7.丁从明、吉振霖、雷雨、梁甄桥，2018：《方言多样性与市场一体化：基于城市圈的视角》，《经济研究》第11期，第148-164页。
- 8.丁涛、盛燕、谭睿鹏、吴华清，2024：《全国统一大市场与经济增长——来自安徽省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证据》，《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2期，第25-46页。
- 9.董敏杰、梁泳梅、张其仔，2015：《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行业比较、地区差距及影响因素》，《经济研究》第1期，第84-98页。

- 10.范欣、李尚, 2020: 《市场分割诱发了企业产能过剩吗?》, 《产业经济研究》第1期, 第15-27页。
- 11.范欣、宋冬林、赵新宇, 2017: 《基础设施建设打破了国内市场分割吗?》, 《经济研究》第2期, 第20-34页。
- 12.范子英、周小昶, 2022: 《财政激励、市场一体化与企业跨地区投资——基于所得税分享改革的研究》, 《中国工业经济》第2期, 第118-136页。
- 13.付成林、王德新, 2023: 《数字经济与统一大市场的因果效应与作用机制——基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视角》, 《南方经济》第12期, 第107-127页。
- 14.桂琦寒、陈敏、陆铭、陈钊, 2006: 《中国国内商品市场趋于分割还是整合: 基于相对价格法的分析》, 《世界经济》第2期, 第20-30页。
- 15.郭庆旺、贾俊雪, 2004: 《中国经济波动的解释: 投资冲击与全要素生产率冲击》, 《管理世界》第7期, 第22-28页。
- 16.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进一步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研究》课题组, 2015: 《当前我国产能过剩的特征、风险及对策研究——基于实地调研及微观数据的分析》, 《管理世界》第4期, 第1-10页。
- 17.胡家勇, 2023: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逻辑和路径》, 《南开经济研究》第11期, 第37-50页。
- 18.江飞涛、耿强、吕大国、李晓萍, 2012: 《地区竞争、体制扭曲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 《中国工业经济》第6期, 第44-56页。
- 19.李雪松、赵宸宇、聂菁, 2017: 《对外投资与企业异质性能利用率》, 《世界经济》第5期, 第73-97页。
- 20.林毅夫、巫和懋、邢亦青, 2010: 《“潮涌现象”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 《经济研究》第10期, 第4-19页。
- 21.刘冲、吴群锋、刘青, 2020: 《交通基础设施、市场可达性与企业生产率——基于竞争和资源配置的视角》, 《经济研究》第7期, 第140-158页。
- 22.刘若鸿、许晏君, 2023: 《工业用地价格与企业产能利用率》, 《世界经济》第11期, 第103-127页。
- 23.刘志彪, 2022: 《全国统一大市场: 怎么看 怎么建》,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第126-128页。
- 24.刘志彪、孔令池, 2021: 《从分割走向整合: 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阻力与对策》, 《中国工业经济》第8期, 第20-36页。
- 25.刘志成, 2022: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本思路与重点举措》, 《改革》第9期, 第54-65页。
- 26.鲁桐、党印, 2014: 《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 分行业比较》, 《经济研究》第6期, 第115-128页。
- 27.吕冰洋、贺颖, 2022: 《中国特色财政激励体制: 基于统一市场的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第24-43页。
- 28.马红旗、田园, 2018: 《市场分割对我国钢铁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 《经济评论》第4期, 第59-71页。
- 29.毛其淋、杨琦、赵瑞丰, 2024: 《贸易网络深化与企业产能利用率》,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9期, 第111-133页。
- 30.沈坤荣、林剑威、傅元海, 2023: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可得性与企业创新边界》, 《中国工业经济》第1期, 第57-75页。
- 31.魏滨辉、罗明忠、曾春影, 2023: 《劳动力返乡创业与县域产业结构升级: 理论线索与经验证据》, 《中国农村经济》第10期, 第26-48页。

- 32.王永进、匡霞、邵文波, 2017: 《信息化、企业柔性 with 产能利用率》, 《世界经济》第 1 期, 第 67-90 页。
- 33.谢莉娟、万长松、武子歆, 2021: 《流通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公有制经济调节效应的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第 6 期, 第 111-127 页。
- 34.向雪凤、牛耕, 2025: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的非农就业促进效应》, 《中国农村经济》第 5 期, 第 166-185 页。
- 35.杨振兵, 2015: 《对外直接投资、市场分割与产能过剩治理》, 《国际贸易问题》第 11 期, 第 121-131 页。
- 36.杨振兵, 2016: 《有偏技术进步视角下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因素分析》,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 8 期, 第 30-46 页。
- 37.于斌斌、陈露, 2019: 《新型城镇化能化解产能过剩吗? 》,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 1 期, 第 22-41 页。
- 38.余东华、吕逸楠, 2015: 《政府不当干预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产能过剩——以中国光伏产业为例》, 《中国工业经济》第 10 期, 第 53-68 页。
- 39.张杰、周晓艳、李勇, 2011: 《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了中国企业R&D? 》, 《经济研究》第 8 期, 第 78-91 页。
- 40.张涛、李均超, 2023: 《网络基础设施、包容性绿色增长与地区差距——基于双重机器学习的因果推断》,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 4 期, 第 113-135 页。
- 41.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2024: 《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座谈会综述》, 《中国工业经济》第 1 期, 第 5-16 页。
- 42.Bloom, N., M. Draca, and J. V. Reenen, 2016, “Trade Induced Technical Change? The Impact of Chinese Imports on Innovation, IT and Productivity”,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3(1): 87-117.
- 43.Byun, S. K., J. M. Oh, and H. Xia, 2021, “Incremental vs.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The Role of Technology Spillovers”, *Management Science*, 67(3): 1779-1802.
- 44.Chaturvedi, A., and V. Martínez, 2016, “Safety Stock, Excess Capacity or Diversification: Trade-offs under Supply and Demand Uncertainty”,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25(1): 77-95.
- 45.Christensen, C. M., 1997, *The Innovator's Dilemma: 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334-357.
- 46.Eaton, J., and S. Kortum, 2002, “Technology, Geography, and Trade”, *Econometrica*, 70(5): 1741-1779.
- 47.Ferrando, A., and A. Ruggieri, 2018,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Euro Area Compan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 Economics*, 23(3): 257-282.
- 48.Han, Y., and M. Wu, 2024, “Inter-Regional Barriers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167, 103197.
- 49.Melitz, M. J., 2003,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71(6): 1695-1725.
- 50.Richardson, S., 2006, “Over-Investment of Free Cash Flow”,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11(2-3): 159-189.
- 51.Shan, J., S. Yang, S. Yang, and Z. Jin, 2014,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Bullwhip Effect in China”,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23(4): 537-551.

How Do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Affect Enterprise Capacity Utilization

WANG Haoyang^{1,2} HUANG Manyu³ YANG Lu³

(1. Research Center for Service Economy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east University;

3.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Summary: Improving enterprise capacity utilization represents a pressing priority for China in its pursuit of supply-side optimiz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s a foundational support and intrinsic requirement of a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plays a crucial role. By eliminating market fragmentation and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it helps leverage the advantages of the super-large Chinese market and unleash domestic demand potential. This institutional reform offers a viable pathway for enterprises to enhance capacity utilizat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on enterprise capacity utilization, using data from Chinese A-share listed firms between 2007 and 2022.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significantly enhances enterprise capacity utilization. This effect is achieved through expanding corporate innovation boundaries, reducing inefficient investments, and optimizing supply-demand matching. Second, at the firm level, the positive effects are more pronounced amo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firms with lower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non-exporting firms. At the industry level, the benefits are greater for non-manufacturing and labor-intensive sectors. At the regional level, the impact is particularly strong in cities with more mature urban clusters and higher digitalization. Third, the reduction in institutional rather than natural fragmentation is identified as the key driver enabl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to boost enterprise capacity utilization.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the strategy to expand domestic demand in deepening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osting domestic circulation.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fully leveraging the advantages of the super-large Chinese market to drive high-quality supply.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primari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while existing literature has not yet reached a consens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and enterprise capacity utiliz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the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affects enterprise capacity utilization, exploring the role of the advantages of the super large market in driving high-quality supply at a micro level. Second, grounded in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of alleviating overcapacity,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intrinsic properti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to investigat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novation boundaries, inefficient investments, and supply-demand matching. Third, this paper develops corresponding indicators to measure institutional and natural fragmentation, 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ir differentiated impacts, thereby providing targeted evidence for enhancing enterprise capacity utilization.

Keywords: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Enterprise Capacity Utilization; Innovation Boundaries; Inefficient Investment; Supply-Demand Matching

JEL Classification: F15; L11; G38

(责任编辑: 何 可)